

一衣同袍，从“momo”的涌现看象征性匿名成因及其文化隐喻

李仪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省武汉市，430070；

摘要：本文探讨了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背景下，网络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界限模糊导致个体隐私泄露问题加剧，进而引发的网络匿名化社交现象。文章以“momo”现象为例，提出并分析了象征性匿名的概念，包括其形式性、群体性和文化性三个特点，还探讨了象征性匿名的成因和文化隐喻。研究发现，象征性匿名不仅是个体对隐私保护的抗争，也是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回应，以及通过仪式化的逃离和趣缘社群的建构来实现群体身份认同。文章最后反思了象征性匿名现象，指出用户在享受匿名带来的自由时，也需警惕网络去抑制效应和媒介依赖陷阱，以确保网络社交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网络匿名化；象征性匿名；隐私；身份认同

DOI：10.69979/3041-0673.24.10.037

随着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的兴起，网络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日渐模糊，个体的隐私逐渐陷入藏无可藏的状态。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23.2%的网民表示过去半年在上网过程中遭遇过个人信息泄露^[1]。人们对隐私泄露的担忧加剧了网络匿名化社交现象，身着“马甲”的网民也在这一过程中，赋予了“匿名化”更丰富的意趣和内涵。

当用户使用微信账号授权登录豆瓣、小红书、知乎等社交平台时，可以选择生成随机昵称及头像，除了最常见的粉红色小恐龙“momo”，微信还提供了阿绿“popo”、阿白“kiki”、欢乐马“happy”等随机身份供用户进行选择。“momo”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各大社交平台上都充斥着“momo”大军的身影，越来越多希望隐藏个人身份信息用户甚至主动将自己的昵称和头像改为“momo”，以这种方式在赛博空间中隐身。

“momo”们的涌现让匿名化的浪潮更加汹涌。不同于以往自主选择个性化的昵称和头像来伪装自己，通过选择默认账号设置，热衷隐匿踪迹的用户们实现了从“一人一甲”到“一衣同袍”的转变，其本质是匿名行为的个体化走向了群体化。网络用户的昵称和头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种自我映射，体现着一种现实关切，可以视作其虚拟形象的象征。而从追求独特性到统一性，背后则是用户对于去个性化和去身份化的高度渴求。

简单的“匿名”二字已无法准确概括网民在“mom

o”事件中的隐匿行为，为精准概括这一复杂的网络现象，本文提出象征性匿名的概念，并对其成因和文化隐喻进行探究。

1 象征性匿名：游走在真实和虚假之间

象征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意念含义，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心世界互相感应契合，因而强调以具体物象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常运用暗示、隐喻、联想和烘托增强表现力^[2]。将“momo”实践中的匿名行为称作象征性匿名，主要是基于其匿名行为呈现出的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形式性。“momo”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匿名，因为用户的社交账号始终与微信、身份证等个人实名信息相关联，“momo”与其他用户一样需要遵守网络空间的规则，同样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伴随着熟人社交媒体与现实生活的重合度越来越高，大众在使用这些平台时会更加倾向于自我包装式的呈现方式，在潜意识中压抑自我情感的真实性表达。而成为“momo”所获得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一种受到约束的相对自由，用户对这种自由的追逐，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熟人社交的厌倦。

二是群体性。个体是构成群体的基础，群体是个体的集合，但又不是随便把各个独立的人集合在一起就可以。它是由一群通过语言或非语言进行交流、彼此都扮演着某种相关角色，为了一个既定目标而相互合作的人

组成的。^[3]一位或几位“momo”无法构成群体性的匿名,只有当大量用户都选择“momo”这个马甲时,用户才能真正隐藏自己,因而“momo”们自诞生起便具备合作关系,行成“momo”群体后,也要受到群体的限制。

三是文化性。“momo”现象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体现了数字化社交背景下的问题投射,背后蕴含着一系列文化隐喻。根据霍尔(Stuart Hall)的“差异”理论,“差异”对文化具有基本意义。而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天然存在文化壁垒^[4]。“momo”现象中,匿名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文化壁垒是青年群体自主自觉建构的,这既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本身就存在的壁垒,也是技术进步赋予亚文化群体的更多文化主导权和话语权。

总的来说,这种象征性匿名的方式为用户自主匿名提供可能,在此基础上的“去身份化”消解了用户来自于真实世界的社交压力,通过群体性高容错降低了个体担错的成本,是一种用户暂避“社会控制”的方式。

2 象征性匿名场域:一个网络异托邦世界

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在三个场合概述了异托邦概念。第一次是在1966年《词与物》的前言中提到异托邦,这时候是用来指涉扰乱句法规则和人心的独特性安排,并且在语言学上与虚幻的乌托邦做了区分,福柯是区分异托邦与乌托邦的第一人;第二次是在同一年的关于乌托邦与文学系列主题一部分的电台广播中,他以比较有趣的方式谈论了异托邦;最后一次是在1967年3月14日建筑研究会上发表的演讲《Des Espaces Autres》上,英译为《另类空间》(Of Other Spaces)或《差异空间》(Different Spaces)^[5]。

福柯认为异托邦是一些特殊空间,在其中社会所促成的一系列关系被暂时中止,以确保社会自身的运转和稳定。它们是使社会成为可能的内在差异。异托邦暂时建立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时间性,它们最终稳定了现实世界的时空安排。福柯提到的所有异质空间都具有这种再次位置化和再次正常化的政治逻辑。“异托邦”意味着另一种真实,既不是经验秩序的,也不是普遍秩序的,而是一种普遍意义的经验,对应着一种系统性的描述,或者一种经验意义的普遍,对应着一种具体性的科学。

异托邦依托于关系和实践,以非具体、非普遍的空间逻辑搭建,是一个拥有多种时空类型的场域,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的空间表征。而网络空间则是以互联网技

术为工具,通过“现实的人”的社会性参与得以形成和发展,流动的信息和信息的流动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样态。二者空间表征的契合催生出了以现实社会关系为基础,由人们的关系和实践构建而成的异质空间——网络异托邦,并对“momo”现象背后通过象征性匿名聚合的趣缘社群提供了一种可供交流的空间情境。

首先,网络异托邦是象征性匿名趣缘社群的主要建构基座。一方面,用户进行象征性匿名实践的场域是虚拟的网络异质场域;另一方面,象征性匿名趣缘社群需要以开放性的阐释语境破除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空间、阶层、代际等隔阂,保障社群内部趣缘关系的纯粹性,网络异托邦所具备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空间特质恰好满足了象征性匿名趣缘社群的建构诉求。其次,网络异托邦开放性与封闭性共存的空间属性契合于象征性匿名趣缘社群的特征。趣缘社群建立于趣缘关系基础上,以圈群化为本质特征,其自身即暗含了开放性与封闭性共存的特质。最后,网络异托邦以其包容性满足了象征性匿名趣缘社群的建构需求。不同于以地缘、业缘、亲缘等关系而建构的社群,趣缘社群拥有高壁垒和交互性双重特征,高壁垒使其形成复杂的开放与封闭系统,交互性则使社群内部流动性和自由性共存,因而其建构诉求极具复杂与多元。

3 理解 momo: 象征性匿名的成因分析

3.1 隐私保护:数字化生存的隐忧与抗争

进入数字化社会,曾经在隐私保护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边界问题,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伴随数字化社会到来而出现的个人言行的数字化,曾经清晰可见的公私领域的区隔正趋向消融。而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智能媒体的普及,则是导致这种趋势不可逆转的技术前提^[6]。数字化社会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公民不可能再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将个人数据作为一种私密数据存放在纯粹的私人空间。个人言行被全部数字化后持续流动,导致不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私人空间。

而选择成为“momo”大军中的一员,可以视为个体对大数据和算法推荐技术侵蚀个人隐私空间的一种抗争和博弈。独特的昵称和头像意味着被人检索到的风险机率更高,而搜索“momo”将会得到成千上万个雷同的社交账号,这样的象征性匿名将个体虚拟身份的识别程度降到最低,某种程度上可以给予自己一定的安全感。许多人因为不希望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和发帖内容信

息被大数据和算法推送给现实生活中的熟人,或者不希望自己的数字足迹被人追踪,主动设置同质化昵称和头像,以集体匿名的方式来隐匿个体个性化身份信息,以此对抗社交平台的算法推送机制,保护自身的隐私,换取更大的自由冲浪的空间。同时,虽然被“偷窥”概率较低,但仍有被发现的可能,因此“momo”仍需考虑他人的凝视与互动,其后台空间不具备完全隐私的特征。这样的后台不再是具有私有属性的,而是具有公共属性的^[7],介于个人表演与隐私空间,是考虑到他人感受的、经过人为修饰的“半隐私”场域。

3.2 自我生产疲劳:社交竞技游戏化引发的倦怠

社交媒体正逐渐占据用户大部分的生活时间,在为用户的社交、消费等活动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问题。随着社交媒体发展与用户数量剧增,社交媒体使用产生的负面效应正在凸显^[8]。社交媒体倦怠被认为是人们面对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种种压力的心理应对措施,这些压力诸如隐私关注、强迫性社交媒体使用、信息过载、社交过载和系统功能过载等。

社交媒体倦怠和自我呈现之间具有天然的矛盾。处在倦怠状态下的用户可能疲于进行自我呈现。但在社交媒体时代,断连和反连接的相关研究进一步说明,数字化时代下,身处其中的社会个体不可能长久持续采取反连接方式。数字化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社会成员产生了一定的制约^[9]。倦怠的情绪并不一定会带来回避行为,在各种压力下,人们可能会继续使用社交媒体^[10]。

而进行象征性匿名就是用户基于此矛盾背景下的一个两全选择。长期以来,用户在各类社交平台被迫参与社交竞技游戏,把自己包装、美化成另一个人,这种理想化的形象塑造是建立在隐藏真实自我的基础上的,因此引发了用户自我生产的疲劳。“momo”的出现给了用户们一个喘息的窗口,通过象征性匿名,大量用户涌入“momo”这一虚拟人物,以极其复杂和包容的形式塑造了一个包罗万象且不会崩塌的人设。在“momo”的外壳下,用户可以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自由地表达自我,而不必担心外界的窥视和评判。

3.3 仪式化的逃离:以个体的沉默发声

试图探究“momo”群体时,我们无法回避一些经典理论,譬如伯明翰学派提出的“仪式的抵抗”,即“亚文化是在通过建立亚文化的意识形态,以此为指导重新

建构反常的亚文化风格和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并以此来对抗主流的意识形态^[11]”。这些传统理论无法准确解释“momo”们的象征性匿名行为,因为他们不再单纯地使用对抗的方式面对主流文化。

霍华德(Howard Morphy)在《当代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将仪式定义为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一种不同于生活常态行为的一种超常态行为。格兰姆斯(Ronald L. Grimes)在其《仪式研究的起点》一书中,将仪式划分为六种类型,仪式化用于指代具有仪式意味的行为方式^[12]。同样,在传播学里,也有关于仪式观的内容:

“传播的仪式观并非是指讯息在空中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传播的仪式观注重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是价值的探讨与构建,其核心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13]“从传播学的仪式观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momo”视为这样一群人:在面对现代性带来的隐私威胁和社交倦怠时,他们从原有的网络场域逃离,以象征性匿名的形式隐匿在集体之下,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异托邦场域。

通过成为“momo”,用户们摒弃了个体的话语权,以沉默的姿态,将发声的权利让渡给集体。各式各样的用户共塑造了“momo”,但也使其成为了一个没有个性和差别的功能客体。

3.4 松散的趣缘社群:建构群体身份认同

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所有人都可以隐藏自身的生理特征和社会身份背景,因此,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中个体之间的互动和吸引更多依靠的是志趣相投和心理认同。

“momo”大军是一种较为独特的趣缘社群,他们并非基于对人或者对事物的兴趣结合而成,而是基于对一种对“身份”的兴趣和对自由匿名冲浪价值观的认同而组成的趣缘社群。尽管“momo”大军是一种极为松散的群体,但却有着相应的“群体规范”。网友在小红书上发布的“momo市市规”得到了许多“momo”们的认同和赞许。

除了通过使用统一的昵称和头像进行身份建构并保持自我认同,“momo”们也会通过群体互动来建构群体认同。如豆瓣“momo”小组的组员目前已经超过11232人,这些人通过加入社群来进一步确定自己的群体身份,并通过与群体成员的交流和互动拉近共享匿名身份

信息的群体内成员的距离。“momo”的集体身份分散了个体在网络空间遭受攻击的力度,也在无形中增强了用户想象中的“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个体害怕孤立和攻击的恐惧感,更加有勇气大胆表达个人意见,因此进一步强化了对“momo”大军的群体认同。

3.5 作为游戏的传播:交易社交货币

史蒂芬森(Wiliam Stephenson)在《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中提出:“大众传播之最妙者,当是允许阅者沉浸于主观性游戏之中者。”^[14]“游戏”和“工作”是其传播游戏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斯蒂芬森认为,游戏具有非功利性,会给人带来愉悦,而工作则是为了获取物质回报的功利活动。

用这一视角重新审视“momo”事件,会发现用户选择成为“momo”,就是一种“游戏”。一个批量复制的头像和名称并不能使用户真正隐藏身份,也即该操作本身其实并没有“工作”性质。而大量用户加入其中进行社交,制造爆梗,创造笑料,进而获取愉悦,恰恰体现了此行为的游戏性、娱乐性以及戏谑性。用户摒弃了在现实世界的身份,不需要功利性的现实回报,出于游戏心理,以一种新的、隐没于人群的网络身份呈现人前,在这样的身份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因而,平台成为了用户愉悦自我的媒介工具,用户在这样的传播中充分体现自主性,自主地投身于“游戏”之中,最终形成了一场集体的狂欢。

同时,随着“momo”大军人数的不断增加,创造出越来越多与“momo”有关的“梗”,这些“梗”形成了新的社交货币,成为用户间自由流通的交流筹码,由此集结而成不同的社交群体,用户可以在群体的归属中寻求认同感。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身份会被各种标签所标记。而“momo”的匿名化使得用户可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身体,从而更好地呈现“自我”,而非“自己”。以此来展开的社交互动,天然带有用户的个性化选择,能够使得用户在平台更容易获得愉悦。

4 “momo”背后:象征性匿名的文化隐喻

隐喻研究源远流长,对隐喻最早进行研究的人当数亚里士多德。其名著《诗学》对隐喻作了系统性阐述,认为隐喻属于比喻语言,是一种修辞格^[15]。当今对隐喻的研究已远远超出了修辞学的范畴,隐喻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多学科、多维度的隐喻研究大大拓宽了隐喻

研究的范围,开辟了隐喻研究的新天地。隐喻是语言的,是思维和认知的,也是文化的。

4.1 同质化的暴力:他者的消失

他者是哲学研究的基础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他者问题在数字化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内容,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思考。数字化不仅从技术层面改变了他者的存在方式,还深刻地改变着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上,更深层次地影响着主体对自身的确认和理解,甚至关涉主体精神世界的存续和发展。

韩炳哲认为,他者的消失和同质化的大行其道,是以数字化的现代交往和消费活动为主要表征的,其社会历史根基是资本逻辑塑造的以绩效为核心的社会,这个社会将他者驱逐出去,留下了一片同质化的噪声^[16]。主体的角度来看,由于他者提供的边界感的消失以及与他者遭遇所带来的诸种差异性生活趣味的丧失,人们不仅在感觉、认知、体验和经历等维度上丧失了自我成长、自我发展的机会,丧失了对世界的丰富性和差异性的内在感受,更从本质上使自身的存在价值降格为生产性的生命,陷入深重的自我异化。在加速发展的社会中,主体生命的降格使其没有与其他差异性主体开展交流、达成共识或者进行对抗的可能性,而只能走入内在的自我逼迫之中,最终在精神和肉体上走向自我毁灭。

而匿名性和去身份化则对应了个体在网络社会中自主性的象征,拒绝被收编和被定位,转而以某种“拟像”作为其在网络空间中话语表达的载体,并发展出了一种高度集群化和联结化的感性互动形式,这一形式的网络空间生产弥散式地分布在网络社会景观中的各个角落,等待着下一个能够被“拟像”消费的对象出现。与个体信任被支付掉的价值本身一样,他们也要信任将价值交付的这个叙事主体能够进行许诺:个体将拥有在其所建构的限定空间中的自由度、以及被返还等值的快感。

4.2 逃避社交自由:摆脱焦虑和孤独

焦虑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就像迈瑞·鲁蒂(Mari Ruti)描述的那样:“如果说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似乎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那就是焦虑,它似乎浸透了我们呼吸的空气。”^[17]焦虑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情感氛围,通过唤起人们的不安、欲望、掌控感、竞争

意识等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做出选择、判断公共政策。

全民焦虑的情绪并不意味着当今社会比以前更糟糕,相反,这个世界在许多方面进步明显:财富迅速增加,物质极大丰富,科技突飞猛进,安全、卫生、医疗、教育水平都有所提高。然而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洞察的那样,与“客观证据”截然相对,“正是全体人类中最受上苍恩宠的‘我们’感受到了更多的威胁、不安与恐惧”^[18]。人们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经历着一个相反的体验过程,可以借用狄更斯的名句来描述这一悖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物质、科技进步令人炫目;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焦虑、担忧不断加剧。

弗洛姆(Erich Fromm)曾指出,当个体从自然中逐渐独立出来时人类的个体化进程便开始了,也只有这种个体化进程的推进才会产生人类的历史,人类才可能从自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并获得自由。然而在个体日渐摆脱掉原始的束缚时,同时也逐渐失去来自自然的安全感,人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在不断摆脱这种自由带来的孤独,从而发生“逃避自由”的现象^[19]。弗洛姆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个人独立于那些使人不能独立且失去爱与理性的内、外在力量,独立于外在力量指个人摆脱对社会、自然以及他人等外在力量或关系的依赖^[20]。人们普遍所说的自由的概念与弗洛姆所说的无异。

一旦个体开始孤独地面对世界时,他们便会通过两种方式来摆脱孤独带给他们的不安感。一是追求积极自由,二是向后退步,放弃自由。在放弃自由的方式中,个体会同时放弃自己的个体性与完整性。此种情况具体地产生了两种逃避的方式,一种是对权威主义机制趋同,另一种则是对趋同的强制。象征性匿名行为消解自我个性,融入匿名集体的过程也是其放弃作为独立个体进行社交的过程,个体以放弃自发性与个性作为代价,通过与他人趋同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感。

5 象征性匿名现象的反思

5.1 网络去抑制效应

网络去抑制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是指人在网络环境中表现出不同于面对面交流时的行为特点,包括放松、较少的约束感和较开放的自我表达^[21]。

因为去抑制化效应的影响,现实生活中的压抑情绪在网络世界可以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在匿名面具的掩藏

之下,人们对自我意见或情绪的宣泄导向会保持着坚定的立场。同时,又因为群体性的高容错率担保,用户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发表冒犯的、极端的、不友好的言论。如果用户在象征性匿名的情况下肆意发泄情绪,不仅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还会影响“momo”群体的形象,为象征性匿名社交蒙上阴影;同时,如果缺乏群体规则的约束和违背群体规范后将产生严重后果的认知,个体在群体的掩盖和“法不责众”的心理驱使下,很可能暴露出更多人性的阴暗面。这就丧失了象征性匿名社交的本意。

无论何时,个人在享受象征性匿名带来的上网自由时,也要注意自由的边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momo”也不是法外之徒,用户在上网时必须遵循网络规范,遵守道德伦理规范,不要让原本愉悦轻松的匿名文化氛围成为滋生“乌合之众”的土壤。

5.2 媒介依赖陷阱

斯蒂芬森认为,“游戏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其既体现着自由意志,又因为现实的逼迫而常常让自由退场^[22]。”用户成为“momo”,通过象征性匿名的方式隐匿在群体之中,依靠这种方式在虚拟网络世界中逃避社会控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举措,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追求快乐、追求自我。

在这样的矛盾下,用户对于快乐的追求就会带有补偿性质,因而也更可能使得其在追求快乐时不加节制。比如,用户在成为“momo”后,带有匿名性的账号使得用户的受限感大大降低,其在发表言论、与人辩论过程中感受到了更多的自由、快感和自我意识,因而可能将更多的时间使用在平台之上以获得长久的愉悦,从而使得用户更加依赖媒介。

6 结语

为了准确定义“momo”事件中兼具形式性、群体性、文化性的匿名行为,本文提出象征性匿名的概念,探讨了“momo”社群作为一个网络异托邦场域的空间特征,并对象征性匿名的成因、文化隐喻和反思做了分析。在象征性匿名的游戏中,用户需要警惕媒介依赖的陷阱,防止沉迷其中,脱离现实社会。同时,用户也需要关注网络去抑制化效应,将自主匿名下的表达与社交活动限定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在自主匿名的游戏中丧失自我,更不要借助匿名的表演引发网络风险,产生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 [1] 《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cnnic.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2023-08-28.
- [2] 巢峰主编：《小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 年。
- [3] 汪雅倩：《‘新型社交方式’：基于主播视角的网络直播间陌生人虚拟互动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87-93 页。
- [4] 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 [5] 支运波：《事件、生命政治与异托邦：福柯的电影批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 年第 4 期，第 4-10 页。
- [6] 顾理平：《超越边界：智媒时代公民隐私保护的核心逻辑》，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 年第 1 期，第 1-10 页。
- [7] 朱逸，尹卫华：《网络直播购物情境下的拟剧化营销——基于抖音直播平台的分析与诠释》，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1 年第 2 期，第 114-124 页。
- [8] Reer, F., Tang, W.Y., & Quandt, T. (2019). Psychosocial well-being and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New Media & Society*, 21(7), 1486 - 1505.
- [9] 张杰，马一琨：《从情境崩溃到情境再分离：社会-关系情境中的用户社交媒介实践——基于微信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的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22 年第 8 期，第 28-48 页。
- [10] 赵启南：《关系性压力下青年使用者社交媒体倦怠影响及其行为结果》，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59-75 页。
- [11] 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通过仪式抵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年，第 33-35 页。
- [12] 王霄冰：《仪式与信仰：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
- [13] 詹姆斯·W·凯瑞，丁未：《作为文化的传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年。
- [14] Mendelsohn, H., & Stephenson, W. . (1967). 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4), 407.
- [15] Aristotle. (1998). *Poe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6] 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第 2-5 页。
- [17] Ruti, M. (2018). *Penis envy and other bad feelings: The emotional cost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8]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
- [19] 弗洛姆：《逃避自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年。
- [20] 杜敏：《‘自由’与‘孤独’——论弗洛姆‘自由’概念的双重维度及其局限性》，载《社会科学家》，2012 年第 7 页，第 42-45 页。
- [21] Suler, J. . (2004). The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7(3), 321-326.